

第二十章

发表中国管理研究论文的挑战

张 燕 李海洋*

美国莱斯大学

本章大纲

一、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管理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二、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实证研究

三、西方理论和中国背景相结合的一些关键问题

3.1 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

3.2 建立整合性理论框架

3.3 将实证结果普适化

四、结语

引 言

学者们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研究时常常会收到评审者如下评论:“为什么你的研究情境是在中国?”“为什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组织理论能够应用到中国情境中去?”“你对现有文献的理论贡献是什么?”等等。在本章中,我们将基于自身的研究经历,讨论我们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展示如何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增强文章的理论贡献并使之更加清晰。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恰当地使用和扩展,西方的组织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情境中的战略问题。此外,我们也认为,如果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可能会导致组织理论重复发明的风险(the risk of wheel-inventing theories)。

* 本文作者鸣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李瑜协助翻译。当然,文责自负。

一、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管理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如果要在国际顶级管理学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的话,其前提是你的文章必须对现有文献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因此,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仔细地考虑他们的研究如何对理论有所贡献,并要明白无误地向读者阐述其文章的贡献。不过,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研究的学者们(包括我们自己)往往倾向于在中国情境中对西方现有的理论进行检验。以此为基础的论文在提交学术刊物进行评审的过程中,刊物的编辑和评审者通常会给出这样的评论:为什么你的研究情境是在中国?为什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组织理论能够被应用到中国的情境中去?你对现有文献的理论贡献是什么?编辑和评审者的这些意见旨在表明,单纯地使用不同的实证背景(例如中国)来检验西方理论本身并不能够构成充分的理论贡献。因此,更好地理解如何扎根中国本土或以中国为情境进行研究以及如何把这种类型的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对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写作本文的最初动力。

一般来讲,存在两种类型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方法:应用型方法(the application approach,即将现有的研究问题、理论、测量和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情境中)与创造型方法(the creation approach,即创造中国情境中特定的研究问题、理论、测量和研究方法)(Tsui, 2006)。根据 Whetten (2002a: 30—31)的看法,应用型的方法代表了“在新情境中的研究”(research IN a new context)。采用这种方法,学者们通常是根据从新情境中得出的实证结果,对普遍接受的学术知识进行修正。这是跨文化研究的一种标准方法,侧重于检验现有理论和结论所隐含假设的局限性。相比而言,创造型的方法则代表了“对新情境的研究”(research OF a new context)。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侧重于描述新颖的、特定情境下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并不显而易见,或者并不为现有的学术领域所熟悉。尽管这两种方法似乎代表了两种极端情况(许多研究倾向于采用两者中的一个),但它们并不一定互相排斥。正如 Roethlisberger (1977)所描绘的那样,有关组织的研究更像一个“知识企业”(knowledge enterprise),它的最大特征是情境化的经验知识和普适性的分析知识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的、不断重复的相互影响(参看 Whetten, 2002a: 31)。因此,组织领域的学者需要不断地通过“将普适性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和“将特定情境的知识普适化”来把新的特定情境下的现象和现有的学术知识连接起来。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这种“连接”呢?

在这一章,我们试图利用自身的研究经历,来阐述中国战略研究的理论构建问题,我们将特别举例说明一些关键问题:如何将普适性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去,以及如何将特定情境的知识普遍化从而使学术文章得以发表。在过去几年,我们从不同刊物的众多评审过程(修改和再提交)中受益良多。从评审者那里,我们收到过不少棘手的问题

题乃至尖锐的批评,例如上面所列举的“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组织理论能够应用到中国情境中?”“你对文献的理论贡献是什么?”等问题。通过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和批评,我们显著地提高了文章的质量并更好地理解情境化和理论化的过程,从而也使我们的文章最终得以发表。

在以下的内容里,我们将首先简要地描述我们修改和再提交的三篇与中国有关的战略研究(见表1)的经历。这些研究在理论(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可占性理论(appropriability theory)和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研究设计(一手调查数据、档案数据和田野研究)等方面各不相同。我们要描述这些文章最初所研究的问题、论文贡献和所使用的理论,然后,讨论刊物编辑和评审者所关心的理论问题^①以及终稿对普适性学术知识的贡献。在对每篇文章进行介绍之后,我们将讨论情境化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之间“连续重复的相互影响”这个关键问题。

二、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实证研究

研究一:Li and Zhang (2007,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这篇文章考察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political networking)和职能经验(functional experience)与新创企业(new ventures)绩效之间的权变关系。在初期版本中,我们试图填补文献中的两个实证空白。首先,此前转型经济情境下的研究重在考察管理连带(关系)(managerial ties)在企业绩效中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背景下的研究则强调管理人员的行业和职能经验(industry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所反映的管理经验的重要性,但没有实证地考察转型经济背景下管理联系和管理经验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的绩效。其次,我们对转型经济的特定背景如何影响管理联系、职能经验与新兴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我们的讨论最初建立在资源基础观(the resource-based view)上。我们认为企业管理人员能够提供两种类型的管理资源:(1)他们在多个职能领域的管理经验和技巧(职能经验)——这反映了他们的人力资本;(2)他们与外部行动者的联系(我们集中考察他们的政治网络)——这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根据资源基础观,我们认为这些管理资源能够帮助新创企业获得好的绩效。虽然我们也提出了权变效应(contingency effect),但是没有触及特定的理论。

^① 我们本章的意图不是讨论中国相关战略研究中的实证问题。对于情境化实证问题,请参考 Tsui(2006)的精彩论述。

表1 三个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研究

论文	样本	所使用的理论	理论对文章的重要作用 (importance of theory to the paper)	文章对理论的贡献 (contributions of the paper to the theory)
Li and Zhang, 2007	对中国技术产业184家新创企业的一手调查数据	资源基础和可占有性理论	帮助建立一个转型经济背景下管理能力的权变价值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并形成研究假设	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结果显示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背景影响新创企业从它们的管理资源中攫取利益的程度
Zhang, Li, Hitt and Cui, 2007	243家国际合资企业档案数据(数据来源来自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	可占有性理论	帮助建立一个转型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权变价值的拱形理论框架并形成研究假设	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转型经济中的研发投资的价值依赖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解决创新的知识泄漏风险
Zhang, George and Chan, 2006	对159个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一手调查数据	社会认同理论	帮助确立研究问题并建立一个整合性理论论点。早先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 现在的研究问题是: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特别是当这些社会身份在地位上不一致的时候	利用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中独特位置来考察这个广泛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显示同高地位群体的认同能够减少低地位群体作为社会身份的来源的盛行,从而避免这种消极认同的负面影响

这篇文章在提交给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进行评审后,评审者反馈各异。一个评审者说:“这项研究的结果……为理解管理能力、制度发展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坚实的贡献。”然而另一个评审者的评论则不太正面,他/她问道:为什么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这个研究问题是有趣的(既然已经预期到这一点)?该评审者进一步指出:“关于你们的交互作用的论断,你们没有抓住所讨论情况的内在复杂性,从而失去了创造发展某些理论的机会。”

我们基本上同意第二位评审者提出的问题,既然能够预见到主效应(main effect)——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就不是特别有意思。事实上,这些主效应假设的作用在于为进一步发展更有趣的权变效应提供了基础。那么问题是: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能够抓住转型经济中管理能力的权变效应复杂性的整合性理论框架(overarch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呢?

经过反复考虑和讨论,我们决定使用可占有性理论(appropriability theory)来建立理论框架。根据 Teece (1986)的研究,可占有性(appropriability)指的是企业能够从他们创新活动中获得报偿的能力。根据这个逻辑,我们认为管理能力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将会随着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修订稿中,我们一开始就直接提出了

主效应假设: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之后我们提出,由于关系能够替代转型经济中不完善的制度结构,因此当制度对新创企业的支持比较弱的时候,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会更强。同时,如果制度背景允许新创企业保留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所产生的收益(rents),那么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会更加重要。基于这样一个总体理论框架,我们考察了新创企业的所有权类型(比如,相对非国有类型的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意味着更强的制度支持)和市场环境中不良竞争(dysfunctional competition)的程度(比如,不良竞争的程度越高意味着制度支持越弱)如何调节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没有受到这些调节变量的影响,而且也显示当新创企业是国有以及/或者市场不良竞争的程度较低的时候,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更强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吻合。

在终稿中,这项研究的贡献已经超越管理能力、所有权和市场不良竞争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实证结合。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新创企业从管理资源、特别是他们的职能经验中攫取利益的。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其他的组织资源和情境变量(能够抓住占有制度上的变化)在转型经济中的角色也有所启示(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做的那样)。

研究二: Zhang, Li, Hitt and Cui (200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这篇文章是在听取了编辑和评审者的评论和建议并经过两轮修改、投稿之后,内容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第一次投稿中,我们考察了市场专注(market focus)(比如,专注出口市场或专注本地市场)和所有权结构(ownership structure)(外资控制与本地控制)如何独立和交互地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合资企业的研发集中度(R&D intensity)。然而,该刊物的部门编辑陆亚东教授和一个评审者对我们的研究关注点提出了质疑。陆亚东教授清楚地指出:“既然已经有很多研究考察了当地市场适应性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源投入的影响(本地研发集中度是资源投入的代理变量),那么直接联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价值可能就比较有限。”他建议如果考察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如何分别和联合调节合资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绩效,这样的话,我们研究的问题将会比较引人注目。

我们完全同意陆亚东教授和那位评审者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接下来就是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来分析这种权变的组合关系。例如,市场专注如何调节研发投资与合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发投资、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各种不同组合对合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甚至更加复杂。受到我们最近发表在《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文章的启发(上文讨论的文章),我们决定使用可占性理论来建立我们的理论框架和形成研究假设。

运用知识泄漏风险 (appropriability hazard) 的概念, 我们提出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 (emerging markets) 上的合资企业面临两种类型的知识泄漏风险: 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和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产生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是因为, 合资企业在以不完善和无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为特征的新兴市场上的研发活动可能会被泄漏给当地的其他企业, 从而使合资企业不能够从它们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充分甚至部分收益。产生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是因为本地合作伙伴可能会滥用跨国公司转移到合资企业的专有技术 (proprietary technology), 以及本地合作伙伴可能会使用合资企业的研发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 研发集中度和国际合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依赖于在新兴市场上潜在的知识泄漏风险水平, 当知识泄漏的风险减少时, 研发集中度和国际合资企业绩效之间可能会出现正向的关系。

基于这个总体理论框架, 我们考察了两种不同的防御机制: (1) 合资企业的市场专注, (2) 所有权结构。我们认为, 合资企业如果更加专注于出口市场, 那么当地其他企业模仿合资企业的研发技术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而减少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此外, 跨国公司拥有多数股权 (大于 50%), 能够使跨国公司对合资企业的研发资源如何使用有更大的控制权, 从而会进一步减少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使用多重组合 (configuration) 的方法, 我们进一步提出, 在出口市场和跨国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情况下, 研发投资对合资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最强。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 (1) 当合资企业专注于出口市场而不是本地市场时, 研发投资对合资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2) 所有权结构对研发投资——合资企业绩效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3) 在合资企业专注于出口市场且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占多数股权的组合下, 研发投资对合资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 但在其他的市场专注及所有权结构的组合下并非如此。

这次修改之后, 我们的研究问题变为: 跨国公司如何在以不完善的产权保护为特征的新兴市场上从它们的研发投资中受益? 正如该刊物编辑所评论的那样, 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通过发展一个相互协调一致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和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影响研发投资和合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仅大大地推动了文献发展, 而且也使理论模型的应用更加广泛。例如, 对于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独资子公司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而言, 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比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和他们的相关性更大。此外, 在一个拥有先进有效产权保护的东道国, 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独资或合资) 可能并不重要。这些情况都是这个研究中所发展和验证的理论观点的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们的理论观点是可以作为考察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 (或者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资源) 及其绩效的总体指导框架。

研究三:Zhang, George and Chan (2006, *Journal of Management*)

在这篇文章的初次投稿中,我们提出了如下研究问题:如果在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中,保留本地高级经理人员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什么因素可能影响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我们提出,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可能会由于具有共同国籍而获得本地员工的认同。如果本地员工被认为不称职(缺乏知识和技能而且不被尊重),那么认同这个群体的自然基础(共同的国籍)将可能导致本地高级经理人员辞职。基于这个论点,我们提出,感知到的本地员工不称职与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有正向关系。我们进一步提出,跨国公司总部与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和总部之间交流的质量、总部对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控制和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对总部的信任——可能对这种正向关系有调节作用。

虽然我们在文章中使用了社会认同理论,我们着眼于使用这个理论去解释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但是并没有对如何发展社会认同理论进行讨论。然而,该刊物的编辑 Carol T. Kulik 教授在她的信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成功的修改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理论上,另一个是方法论上的。首先,在理论方面,我想要看到你们对该论文理论贡献更广泛和清晰的理解。目前你们只是把研究局限在新兴市场上跨国公司的本地经理身上。然而,我相信这里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关于组织成员如何处理他们的双重身份问题,特别是当一种身份被丑化或者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我想要看到你们在更大程度上——既在前面的理论背景又在后面的讨论中——强调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更加广泛的框架,我们就有可能要在各种类型的组织(例如跨国公司和纯粹的国内企业)中的各种类型的员工(例如本地非管理人员、本地管理人员和海外雇员)分别发展离职理论/模型。”(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看来,对于 Kulik 教授来说,有关理论方面的讨论将直接影响到这篇论文是否被接受发表。我们也同意她的看法。

经过两轮的修改和再评审之后,我们成功地阐述了这个主要的理论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在文章的最终稿中,一开始我们就谈到了社会认同理论。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了社会认同理论和它建立在组内偏差(ingroup bias)上的核心观点,然后讨论了社会认同理论最近的研究进展。社会认同理论最近的研究进展表明,地位高的群体比地位低的群体更加有偏见,当地位高的群体受到地位低的群体认同时,他们会显示出与组内偏好(ingroup favoritism)相反的看法。在对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我们指出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缺口。大部分早先的研究认为每个人只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或者属于高地位群体或者属于低地位群体。然而,因为存在多种社会分类的基础,例如性别、年龄分组、国籍和在组织层级中的位置等,一个人能够同时属于多个群体。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研究问题是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特别是当他们的社会身份在地位方面不一致的时候(例如当一个身份被丑化或处于相对不利位置的时候)。

我们认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代表了一个探讨更广泛理论问

题的合适情境。跨国公司子公司中的本地高级经理在他们的组织中处于一个相对独特的位置,从而使他们有可能认同在工作环境中地位相当不同的两个群体。一方面,他们可以作为“本地人”认同本地员工,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作为“高级经理人员”认同总部管理层。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双重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离职意向。我们认为,如果本地员工被认为是不称职的,那么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为了避免和不称职本地员工的负向认同可能会想离职。我们进一步指出本地高级经理人员获得总部管理者(一个高地位群体)认同的程度越高——通过更高质量的交流、更低水平的控制(也就是越高的自治)和更高水平的信任——他们同相对较低地位群体之间的认同会变得不太可能,因此感知到的本地员工的不称职和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离职意向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将会减弱。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个论断。

在最终稿中,我们的贡献超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高级经理人员的特定情境。我们的研究结果对社会认同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能够被应用到其他情境。这是因为具有两个或者更多在地位上不一致的社会身份在复杂多样的现代组织中并不少见。例如,黑人经理人员可能认同地位不一致的两个群体:黑人(传统上一个种族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和经理人员(基于组织层级地位相对高的群体)。考察多重社会身份问题不仅丰富了社会认同理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组织中影响群体间和群体内过程的机制。我们的结果显示,为了保留雇员,组织应该促使正向的身份认同而减少负向的身份认同。

在 Kulik 教授的论文接受信里,她对我们的修改感到非常满意。她表示:“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篇文章在前面及中间部分突出其理论贡献。我认为你们非常有效地传达了你们所研究的社会身份问题而且没有失去特殊应用中有意思的成分。与先前的版本相比,这个版本将会吸引更加广泛的读者。”

三、西方理论和中国背景相结合的一些关键问题

以上我们简短地描述了三篇文章修改和再投稿的过程,通过听取编辑和评审者的评论和建议,我们进一步修改了文章并使文章最终得到发表。基于此,本节将讨论西方理论和中国背景结合的一些关键问题:(1) 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2) 建立整合性理论框架;(3) 将实证结果普适化。前两个问题是如何将普适性知识(理论)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特定情境的知识(研究结果)普遍化。这三个问题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情境化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

3.1 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

Huff (1999)专门探讨了如何写作并发表学术论文。Huff 鼓励作者把“写作学术论文”和“加入学术对话讨论”类似看待。根据 Huff 的观点,写作学术文章的作者需要“确

定合适的研究问题”。换句话说,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听众是谁?为什么所研究的问题是和听众相关的而且是有趣的?许多学者的研究问题通常关注文献中没有考察过的变量之间的实证联系而不是更广泛的理论问题,但是,这样的研究问题仅仅会让有限的听众感兴趣。相反,理论能够指引作者确定合适的听众和研究问题。

Zhang, George 和 Chan (2006) 的文章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如上文所指,在初次投稿中,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因素可能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这个研究问题的目标听众范围非常狭窄(例如那些对跨国公司保留当地高级经理人员感兴趣的人)。在最终稿中,依据社会认同理论,我们的研究考察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特别是当这些社会身份在社会地位上不一致的时候?既然多重社会身份在现代组织中相当普遍(例如,女性经理人员、少数民族经理人员、跨职能团队和联盟管理团队等)。这个研究问题的听众更广,从而使这个研究能够加入到一个现有的更加广泛的学术对话中去。

在另外三篇文章中,我们也用理论去改造我们的研究问题。例如,在 Li 和 Zhang (2007) 中,早期版本的研究问题是: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绩效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被新创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市场不良竞争的程度所调节?在最终的版本中,因为可占有性理论的引导,研究问题要广泛得多:企业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转型经济中从他们的管理能力中受益?在 Zhang, Li, Hitt 和 Cui (2007) 的文章中,起初的研究问题是这样的:合资企业的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如何分别以及联合影响合资企业的研发集中度?与之相比,最终版本的研究问题变为:跨国公司如何在产权保护弱的转型经济中从其研发投入中受益?

很清楚所有这三篇文章最初的研究问题都是以变量为中心并重点考察变量之间的实证联系。这些定义狭窄的研究问题有可能要我们为每种情况(例如,每种类型的雇员、每种类型的组织、转型经济中企业的每种环境维度、资源维度和战略维度)分别发展和检验理论/模型。不过,在理论的指导下,这些文章的最终稿都提出了更普遍、更合适并且更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问题。

3.2 建立整合性理论框架

一篇好文章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它的理论框架的一致性或简约性 (Dubin, 1978; Whetten, 1989)。在一个一致性的理论框架里,各部分(例如,因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等)都是整体框架的自然组成部分。那些对理论框架带来很少附加价值的因素不应当被包含在框架内。这样的框架能够整体地指导一项研究并且支持每种特定的关系。相反,没有理论的一致性,框架将会变得支离破碎,毫无完整性可言。在这样的框架里,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为什么模型中的变量对理解被研究的现象来说是重要的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没有合理的论据阐明为什么所研究的变量之间相互关联。针对这种情况,评审者经常会做出如下评论: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概念的简单堆砌和各种理

论的混为一谈。理论能够让学者建立起一个一致性的总体理论框架,从而能推导出研究假设并把他们整合到一起。通过建立一致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我们以上所讨论的三篇文章最终都得到了很大改进和提高,从而得以发表。

Li 和 Zhang (2007) 的文章考察了影响管理能力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两个调节变量(所有权类型和环境不良竞争的水平)。我们为什么集中考察这些调节变量呢?它们如何组合?这些调节变量的理论意义是什么?在早期版本中,因为缺少一致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终稿中,我们使用可占有性理论建立了一个一致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指出,由于政治网络能够替代不完善的制度结构,因此在制度支持较弱的情况下,转型经济中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更有价值;如果制度背景允许新创企业保留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所产生的收益,那么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就更有价值。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我们提出了权变的假设。由于所有权类型和市场上不良竞争的水平符合我们整合性理论框架的逻辑,并能用来检验文章的理论框架,我们使用这两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我们认为,和其他所有权类型的新创企业相比,国有的新创企业面临的制度支持越强,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弱,国有新创企业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相似地,我们认为市场上不良竞争的程度越高,制度支持(例如产权保护和契约履行等)就会越弱,因而管理人员政治网络的正向效应会越强,管理人员职能经验的正向效应会越弱。

与之类似,Zhang, Li, Hitt 和 Cui (2007) 的文章在提出特定研究假设之前也发展了一个一致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指出,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合资企业面对两种类型的知识泄漏风险: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和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当知识泄漏风险减少时,研发集中度和国际合资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这个论断是建立在我们的合资企业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如何分别和联合调节研发集中度和合资企业绩效的关系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基础上的。我们认为合资企业专注于出口市场有助于减轻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跨国公司拥有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有助于减轻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漏风险。这个研究的实证结果不仅昭示了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支持这个普适理论框架的证据。

3.3 将实证结果普适化

评审者在评审与中国有关的战略研究的论文时总是纠缠于这样的问题:你如何将来自于中国情境下的研究结果应用到其他情境中?虽然期望与中国有关的战略研究能应用到所有其他可能的情境中去并不公平,但对于中国有关的战略研究而言,情境敏感性确实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国际顶级管理学刊物上有关中国企业战略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很多评审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缺乏了解。通常,为了回答这个普适化的问题,学者们

可能会讨论样本的特征并同其他类似研究作样本和研究结果的比较。学者们也可能会考虑“理论效应是否会随时间而变化,或者因为存在其他理论上重要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而使理论效应不稳定?”(Whetten, 1989: 492)。虽然这些方法都有用,但我们相信使用理论是回答这个普适化(generalization)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如果一篇论文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那么即使样本、测度和方法是情境特定的,研究的实证结果也能够对理论提供广泛的指导和启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Huff (1999) 关于写作学术论文就像参加学术对话的评论。Huff 认为,学者们在写文章时要强调自己的研究对所加入的学术对话的特定贡献。也就是说,当一些人在围绕某个或某些问题进行对话时,请想象一下你的加入会给这场对话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或者新的方法)。相似地,Whetten (2002a: 30) 也指出,学者们在研究新的、特定情境中的某个现象时将会面对两个障碍:“(1) 让同事们对新现象熟悉起来;(2) 证明该现象和当前讨论是相关的。”

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够将情境化的研究结果普遍应用到更广泛的文献中去,是因为我们的模型是建立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之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研究和现有的理论是紧密相连的,这种相连能够使我们将发现的特定情境的研究结果普遍化。例如,在 Zhang, George 和 Chan (2006) 的研究中,结果发现所感知到的当地员工不称职和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正相关,而且当总部和本地高级经理之间的交流质量高并且/或者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对总部管理层高度信任的时候,这种正相关关系会进一步减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这些实证结果至多只能说明所感知到的当地员工不称职和总部—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分别或者联合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本地高级经理的离职意向。然而,注意作者在一开始就识别了一个广泛的研究问题:组织成员如何处理他们的双重身份?特别是当一种身份被丑化或者处于相对不利位置的时候?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作者阐述了更加广泛的理论问题。这样,他们的实证结果的贡献就超出所检验的实证关系——他们的实证发现为他们的普适性理论观点提供了证据。因为理论观点可以普遍应用,所以他们的研究发现能够对其他情境(例如现代组织中女性经理和黑人经理)的研究提供启示。

在 Zhang, Li, Hitt 和 Cui (2007) 的研究中,结果显示:(1) 当合资企业专注于出口市场而不是专注于当地市场时,研发集中度对合资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2) 在专注于出口市场和跨国公司占多数股权的情况下,研发集中度对合资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但在其他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的组合下并非如此。因为作者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所以这些实证研究结果的贡献超出了所考察的特定实证联系。这些实证结果为整合性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证支持,而且能够普遍应用到其他情境,例如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独资子公司或者跨国公司在产权保护更加先进有效的东道国的子公司(独资或合资)中去。

Li 和 Zhang (2007) 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国有的新创

企业和/或市场上不良竞争程度较低时,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没有坚实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这些研究结果仅仅能显示所有权类型和不良竞争会如何调节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要为各种类型的权变变量分别发展和检验模型。然而,因为研究假设来自于整合性理论模型,实证的研究结果能够对更加广泛的问题有所启示:新创企业如何从它们的资源中获得利益?这项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新创企业能够从资源中获得利益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环境中占有制度(appropriability regime)的完善程度。因此,这些发现能被推广应用到新创企业其他类型的资源和新创企业所面临的其他占有制度的情形中去。

四、结 语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通常是从一个有趣的、独特的中国情境现象开始。我们试图讨论的问题不是源于现有的理论,而是源于新颖的、与中国特定情境相关的现象。在选择“研究什么”的时候,用 Tsui(2006)的话来说,我们采用了“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方法。这种“由内而外”的方法通常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有的问题。相反,“由外而内”的方法却是在考察中国情境中现有文献所关注的话题或者现象(Tsui, 2006: 3)。正如 Tsui(2006: 3)进一步指出的,“我倡导和支持‘由内而外’的方法,‘由内而外’的方法确定重要的独特问题或者至少是对中国企业、经理人员和雇员重要的问题,即使这样的现象对于这个情境外的学者可能陌生的。”比较而言,“由外而内”的方法则有可能错过在中国情境中真正重要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当然,使用“由外而内”的方法要求作者对中国有深刻的了解。我们从早前在中国的研究经历、对中国经理人员的访谈和经常阅读中国管理类学术期刊中(比如,《管理世界》、《经济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等)受益良多。

然而,当谈到“如何研究”时,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Tsui(2006:4)批评了应用型方法(即直接把西方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情境中)所隐含的问题,“观察和分析被限定在现有理论中的变量和隐含逻辑中”。但西方理论赖以建立的一些关键假设可能在中国情境中并不正确。因此,她建议学者可以在中国情境中创造必须通过完全不同的视角才能发现的新的理论(Tsui, 2006: 7)。

我们的方法居于应用和创造两种方法中间,代表了“利用西方理论或将其拓展到中国情境的理论构建研究”(Tsui, 2006: 7)。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不是西方理论的直接应用,其原因如下:(1)我们从中国背景下新颖的现象引出“研究什么”;(2)我们通过整合西方现有理论和中国情境来建立整合性理论框架;(3)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研究的变量和关系尚未在文献中考察过。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西方理论(并非完全不同)基础之上而且和现有的文献紧密相关。通过重复研究过程(和广泛应用于扎根理论

构建研究的重复研究过程相类似),我们来实现这种平衡(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 Glaser and Strauss, 1967; Whetten, 2002b)。

在扎根理论构建研究中(grounded theory-building research)(详细讨论请参见 Glaser and Strauss, 1967; Whetten, 2002b),学者从熟悉数据开始,然后确定关键的构念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来接近数据。通常,他们会经历一个在“理论”和“数据”之间来回的重复过程直到他们对“模型”和“数据”之间的“契合”感到满意。我们以上讨论的所有三篇研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在“理论”和“数据”之间来回的重复过程。从熟悉数据开始(对现象的观测和初步实证研究结果),之后我们回到理论中去并使用各种理论(不仅仅使用一个理论)来解释数据。不同的理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实证模型和关系,于是我们又回到数据来检验其他的模型和关系。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我们(以及编辑和评审者)对“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契合感到满意。这样一个重复过程的结果是,我们的研究在保持独特的情境化知识的同时能够加入到现有的学术对话中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利用独特的情境化知识来拓展现有的理论。正如 Whetten (2002a: 31)所观察到的:“这种将新的特定情境的现象和现有的学术知识联系起来的模式说明了过去的二十年里组织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发展。”显然,我们的方法和 Whetten 的观察一致。

最后,我们想要指出,在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战略问题时,片面强调“创造理论”可能会有潜在的危险。虽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是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在根本上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它们都要建立核心竞争力、形成联盟、进行研发、开发新产品和服务、适应环境变化、建立和保持有效的管理团队以及与本地和外国竞争者竞争等。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市场机制转型以及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竞争,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现有的西方理论例如资源基础观、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和可占有性理论能够而且应该可以用来考察与中国相关的战略问题。相反,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中国企业的独特性,我们有可能会面临重复发明理论的危险以及将中国战略研究和现有的学术对话和知识构建相隔离,从而使得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研究变得边缘化。

总之,在本章中,我们利用自身的研究经历,着重讨论了如何将西方理论和中国情境相结合来考察与中国相关的战略问题。我们的经历和经验反映了西方理论和中国情境之间连续重复的相互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经历和经验能够对其他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战略研究的学者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Dubin, R. 1978. *Theory Building*. New York: Free Press.

Eisenhardt, K. M. and Graebner, M. E. (2007).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25—32.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Wiedenfeld and Nicholson.

Huff, A. S. (1999). *Writing for Scholarly Publ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 H. and Y. Zhang (2007).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791—804.

Teece, D. J. (1986).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olicy*, 15, 285—305.

Tsui, A. (2006).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 1—13.

Whetten, D. A. (1989).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90—495.

Whetten, D. A. (2002a). Constructing cross-context scholarly conversations. In Tsui, A. and Lau, C. M. (eds.),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9—47.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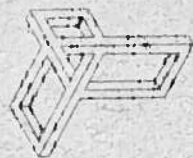
Whetten, D. A. (2002b). Modeling-as-theorizing: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for theory development. In Partington, D. (ed.), *Essential Skills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45—71. London, UK: Sage.

Zhang, Y., H. Li, M. Hitt and G. Cui (2007). R&D intensity and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market: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rket focu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944—960.

Zhang, Y., J. M. George and T. S. Chan (2006). The paradox of dueling identities: The case of local senior executives in MNC subsidia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2(3), 400—425.

陈晚萍 徐淑英 樊景立◎主编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 实证方法



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